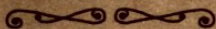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

# 明季滇黔佛教考

(外宗教史论著八种)

陈垣 著



上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

# 明季滇黔佛教考

(外宗教史论著八种)

陈垣 著

上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

# 明季滇黔佛教考

(外宗教史论著八种)

陈垣 著

下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季滇黔佛教考/陈垣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0. 7

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 
ISBN 7-5434-3854-2

I. 元… II. 陈… III. 宗教史-研究-世界  
IV. B929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4284 号

---

书 名	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明季滇黔佛教考(外宗教史论著八种)上、下
作 者	陈 垣 著

---

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 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27.5

字 数 565 千字

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434-3854-2/K·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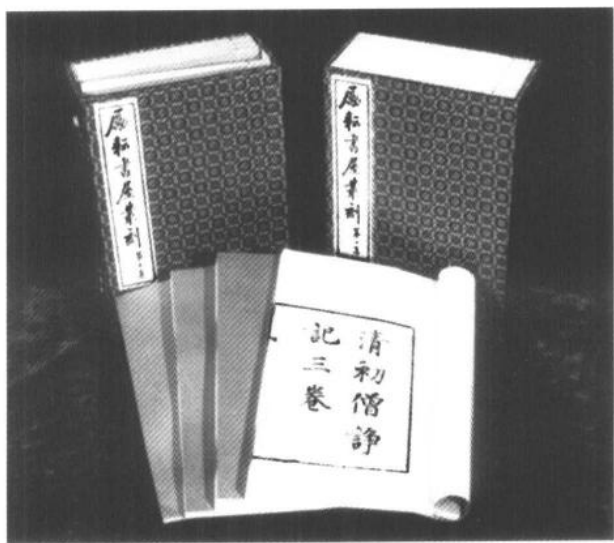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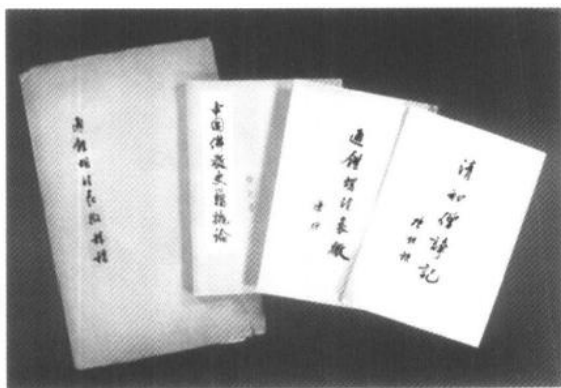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35.80 元





**陈 垣**(1880~1971)字援庵。广东新会人。自幼自学,曾习医,并创办光华医学  
校。辛亥革命后弃医从政,创办《震旦日报》,1912年民国成立,当选为众议院议员。  
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,定居北京,专意治史。曾任国立北京大学、北平师范大  
学、辅仁大学教授、导师。1926~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,1952~1971年任北京师  
范大学校长,并曾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  
究所第二所所长等职。主要著述有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、《校勘学释例》、《史讳举例》、  
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、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、《清初僧诤记》、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及  
《通鉴胡注表微》等,主要论文结集为《陈垣学术论文集》。

◎明季滇黔佛教考(外宗教史论著八种)



陈垣先生部分著作书影

---

---

## 出版说明

20 世纪是中国史学发展最显著、变革最深刻的时期。新时代、新史观、新史料、新方法、新的学术文化氛围等等，造就了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。

20 世纪中国史学，大家辈出，学派林立，名著累累，异彩纷呈，在中国史学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现在的中国史学和未来的中国史学都得力于并将继续得力于先贤的 these 努力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，代表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前进方向。

20 世纪中国史学，是中国历史学家研究成果在学术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反映，成为时代的宏伟纪录；同时，它又反作用于前者，在促进社会变革与革命、增强爱国主义、加强民族团结、推动社会进步、提高民族素质、增益人们智慧等方面，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。

20 世纪中国史学，是 20 世纪世界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。如果说 20 世纪的外国史学对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话，那么，近几十年来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来，中国史学也在逐步扩大它对外国史学发展的影响。这种双向的

交流和影响，必将有利于推动世界史学的进一步发展。

在世纪之交，编辑、出版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》，是对百年史学名著的整理和总结，是尊重它们在史学上的成就和史学史上的地位，也是为后人学习、研究 20 世纪中国史学优秀遗产提供方便，是学术文化积累的基础工程。同时，这个工程也为外国学者进一步了解 20 世纪中国史学提供方便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套书也可看作是向世界展示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学术长廊。

本社有志于从事这一尊重前人、裨益今人、嘉惠后人的文化出版工程。目的是推动中国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、促进中外史学交流。我们在史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，决定编辑、出版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》。这一工程繁重浩大，工作烦琐，限于我们的识见和能力，舛误纰缪在所难免，敬祈方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。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1999 年 12 月



## 编校凡例

一、编选范围。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》编选 20 世纪出版的、对当时史学发展或对其后史学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和重大影响，即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者。专著、论集，一视同仁；名著、名篇，皆所珍惜。范围既广，其工甚巨，故先期编选部分已辞世的史学家的名著。

二、版本与编次。尽量选择好的底本，即作者的修订本或校阅本，精心编校，自成一卷。每卷冠有作者照片、小传、书影、手迹等。书首有总序，继之为目录、前言、正文，正文后或有附录，书末以作者著述要目为殿。原著按旧式提行分段者，改为现在通行的分段形式。独立成段的引文变换字体缩格排印。原著用文末注者，改为页下脚注；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小字夹注；夹注首尾原用括号者，一般删去括号；注文自成单元。

三、编校原则。除版式与必要的技术性处理外，原著的内容及结构，一仍其旧，以存文本原貌。

四、规范用字。改异体字为正体字，改繁体字为简化字，原则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55

年12月22日发布的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的《简化字总表》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、国家教育委员会1988年1月26日发布的《现代汉语通用字表》为准。凡属繁体字与简化字一对一者，均用简化字，如赵与赵、兴与兴等；如系多对一者或多音多义字，则根据情况区别对待，如乾、幹与干等。对于姓名、地名、书名等专用名词，如用正体字、简化字容易产生歧义者，则保留原来的文字形体，如文徵明不改为文证明，鄠县不改为户县，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不改为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等。通假字、古今字、省形字等均保留原貌。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语言，每个作者都有其惯用字词，凡有根据者则不改为现在通行的字词。

五、标点符号。凡竖排、无标点或用旧式句读者，除个别有特殊要求者或限于目前的技术条件无法排印者外，一律改为横排、新式标点。标点符号的使用，以1996年6月1日起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》为准。原著有专名（如人名、地名等）号者，均予省略；如专名号所标为并列关系且非集合词语者，其间加顿号以便区别。书名号一律用规范形式（《 》、〈 〉，外文书名排斜体），原著无书名号或书名号不规范、不完整者，一律补加或改正。

六、校改讹误。原著多为流传已久的名著，对其文字一般不作改动。但确属错讹者，在所当改；一般笔画之误，鲁鱼淆舛，显系误写错排者，径改不出校记。前人引书，常有省略约减或个别词语的更动，只要不失原意，则不以所引书改动引文。确需校改增删之处，用尖括号（< >）括住的字词，表示删去；用方括号〔 〕括住的字词，表示改正；用

六角括号(〔 〕)括住的字词，表示增补。对校改增删者，一般加圈码右上角注注号(①、②、③……)，并在同页脚注中说明校改增删理由及根据，其后用“校者注”字样与原著注释加以区分。

七、残缺处理。原著中因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而致无法辨认，又无其他版本可据以核查者，根据所缺字数用“□”表示；所缺字数无法确定者，用“(下缺)”表示。

八、数字用法。一般保留原著的用法。如同一部书或同一卷书数字用法不一致时，一律用汉字表示。

# 总 序

戴 逸

20世纪即将过去,21世纪即将到来。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学,它经历了曲折崎岖的路程,也取得了伟大丰厚的成绩。这一百年内产生了不少杰出的历史学家,像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垣、陈寅恪、胡适、顾颉刚、钱穆、郭沫若、范文澜、翦伯赞、吕振羽、侯外庐,等等,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情况。杰出的历史学家,一百年出不了几个。两千多年前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;司马迁死后一百多年,产生了班固;班固死后五十多年产生了荀悦;又过了八十多年产生了陈寿。11世纪产生了欧阳修和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、刘攽与范祖禹,12世纪产生了郑樵。18世纪历史学家比较多,像赵翼、钱大昕、王鸣盛、全祖望、章学诚,等等。20世纪的历史学家就更多了,代表作也比较多。最重要的是

20世纪前期完成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过渡。同时,20世纪发现的史料大大促进了本世纪史学的发展,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。汉代在孔壁里发现了《古文尚书》,西晋时在战国魏墓中发现了《竹书纪年》,这在学术史上均可大书特书。但在古代,这种重大发现数量不算多,时间间隔也很长。20世纪史料的发现是过去任何时代不能相比的,是大批的、连续的、重大的发现;从古到今都有,极为丰富。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了甲骨文,还有金文即钟鼎文(金石文字从宋以后已有不少发现),产生了王国维、罗振玉、李济、郭沫若、董作宾、胡厚宣等一大批研究专家。如果没有甲骨文、金文的发现,他们的成绩就不会那么大。二是帛书和简牍的发现。长沙马王堆帛书和山东临沂、湖北云梦、甘肃居延等地简牍的出土,对先秦史和秦汉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,由此产生了劳幹等研究专家。三是敦煌文书的发现,促进了魏晋南北朝、隋唐以及宋、西夏历史研究的深入,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容,产生出陈寅恪、常书鸿、唐长孺等一大批学者。四是外文材料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如蒙古文、满文史料的发掘利用,扩大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范围,产生出陈垣、冯承钧、韩儒林、向达等一批蒙元史、中外交通史以及世界史研究专家。五是明清档案的开放使用。这部分材料极其丰富,有上千万件,有的一件材料就能装一汽车,管理这批档案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二百人;研究专家则有孟森、郑天挺、王钟翰等。有的学者非常重视史料,例如傅斯年说史料就是史学。这个说法不一定很合适,但是强调史料的重要,也有它的合理性。有的专家穷年累月,劳精费神,一辈子搞史料,这也是对史学的贡献,不能因为他专搞史料,就说他不是史学家。史料研究是

关系到历史学盛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
回顾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，可以概括出它的三个主要特点。

第一，进化史观的引进。这是 20 世纪历史学的显著标志。自从严复翻译了《天演论》，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中国，中国近代学术均奉之为圭臬。在此以前的史学，可以划到传统史学里去。20 世纪初，梁启超发表《中国史叙论》、《新史学》，夏曾佑著《中国古代史》，提出“史界革命”，显然是受到西方的影响，提倡以进化史观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。中国传统史学有一种影响很大的历史观念，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传中国的道统，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。“新史学”显然不同，主张历史是进步的。今文学派和康有为的思想中已经有进化史观的因素，但更明确地提出系统的进化观点的则是梁启超。他认为不进行史界革命，中国就没有出路。他说：“史界革命不起，则吾国遂不可救。悠悠万事，惟此为大。”（《新史学·中国之旧史》）以后的历史学家，包括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陈垣、胡适、傅斯年等人，都具有进化史观。进化史观不但认为历史是进步的，同时还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。梁启超就曾经反复强调过这一点。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批判，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之上的。顾颉刚提出“层累地造成古史”观，实际上是进化史观走到极端的产物。他提出了疑古辨伪思想，认为上古时代不仅不是进步的，而且儒家宣扬的那种黄金时代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。当时怀疑古书、否定古史的风气非常盛行。这种疑古观念有它的片面性，但在廓清古史迷雾方面，它是有贡献的。古代确实有很多传说的东西，不可深信，但也不

可完全丢弃，传说中包含着历史真实的颗粒。顾颉刚等通过辨伪祛疑，还历史真实面目，功劳很大，不可磨灭。

第二，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。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伟大进步。20年代以后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。唯物史观相对于进化论来说，是更高层次上的理论，它承认进化史观，包含了进化史观的合理内核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受达尔文学说影响产生的。那么，唯物史观给史学增加了什么新内容呢？一是唯物史观在承认历史是进步的、具有因果关系的同时，明确提出客观世界是被规律所制约的，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。当然，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要牢牢记住，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不一样。社会有人参与，有主观参与，内容更加复杂。历史规律不像自然界规律那样单纯，而是掺进了人的活动，通过偶然来实现必然，所以对历史的研究更加复杂。但历史规律是客观的，不是主观的。这一点不仅与唯心史观不同，与进化史观也是不同的。后来出现的弊端是把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一样看待，过分强调规律，陷入了机械唯物论。二是承认历史是前进的，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、生产方式的发展，是经济原因。历史发展是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，并不仅仅是经济在其中起作用，如果单纯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，又会陷入简单的经济决定论。要重视历史发展中多种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。不重视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、军事的、地理的种种因素，在历史研究中就不能前进一步。因此，唯物史观一方面区别于唯心史观那种把英雄人物或思想、政治和上层建筑视为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观点，另一方面也区别于机械唯物论不承认其他因素起作用的观点。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最重要的作用，

这是唯物史观给我们认识上增加的新内容。三是唯物史观把阶级斗争看做阶级社会前进的动力。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,阶级存在于社会统一体内,各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对立,又相互统一,不能把社会看成仅仅是阶级之间的斗争。把阶级斗争绝对化,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,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。在20世纪,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。无论马克思主义者,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,都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,这是事实。同时也要承认,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及进化史观虽然不同,但并非与之绝对对立,而是吸收了传统史学的精华,认同于进化史观而更加科学化了。过去我们往往把它们对立起来,应该汲取这个教训。

第三,理性精神的张扬,或曰理性的发醒。所谓理性精神,就是承认人具有正确认知客观历史的能力。这是相对于蒙昧主义和宗教思想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、是由超自然力量主宰的观点而言的,也是相对于仅凭主观感悟认知世界而言的。理性精神是用人的心智来分析、论证、解释历史,依靠理性的推导、逻辑的证明,归纳演绎出结论,而不是按照超自然力量的启示、按照人的直观感悟理解历史。一旦离开理性,就无法正确认识任何历史问题。过去乾嘉学派颇有一点近代的理性精神。他们以“实事求是”作为治学宗旨,重视证据,无征不信,不受权威影响,有独立的研究精神,即使对《尚书》这样权威性的古书也不迷信不盲从。这种理性精神,是传统史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。中国传统史学的具体成果是很多的,但如果从中国传统认知方式来看,我感觉中国的思想认识方式还是一种直观的感悟,有点像佛教禅



宗的顿悟。宋明理学是用直观方法，从整体上把握认知对象；而乾嘉学派是从具体方面分析、归纳、演绎，从而达到理性认识。这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法。中国传统中感悟式认知方法比较发达，而理性方面的认识比较少。当然，在后来的著作中，如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考异》，也有这方面的因素。考证学也有这种理性因素，事实是怎么回事，就是怎么回事。这种认知方法更接近于近代科学认识方法。近代科学是把对象独立起来进行研究，排除外部干扰，在实验室里通过实验得出结论。我觉得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和玄学之争，就是这两种认知方法的不同路径，是理性分析与直观感悟之争。玄学也不是胡说八道，也有它的道理。胡适他们主张科学，更具有理性精神。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观，如梁启超的“中国历史研究法”，王国维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胡适的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，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路数，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方法。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著作，20年代有李大钊的《史学要论》。研究成绩最大、起步最早的当推郭沫若，他的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不论现在看来有什么缺点，却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。以后，吕振羽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最早提出西周封建说。中国历史学在突破传统以后，没过多久就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。尽管当时李大钊、郭沫若以及后来的范文澜、翦伯赞、吕振羽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论上尚未成熟，研究成果难免有粗糙之处，但这时的历史学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，既和传统史学不同，也和近代实证史学不同。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，即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是什么关系。马克思主义史学实际上吸收了实证主义史学的优点，比如进